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illustration. It depicts a rugged, rocky landscape with a large, dark, textured rock formation on the right. In the center, a figure is seated on a rock, looking towards the left. To the right of the seated figure, another figure stands, holding a long staff or pole.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ainting.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there is a red seal with a white border,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徐开' (Xu Kai) in seal script.

徐开
全
散
文
选

X
K
L
S
W
X

徐开
全
散
文
选

631444

L267
802

徐开垒散文选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西宁

徐开垒散文选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1.875 插页: 2 字数: 285,000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413

统一书号: 10097·472 定价: 2.00元

ISBN 7-225-00084-5/I·7

徐开垒论(代序)

冒 斯 庄汉新

徐开垒同志是一位辛勤跋涉、独具风采的散文家，一位对生活的冷暖，人民的悲欢富于高度敏感的歌者。他在早年就向往着“做一只候鸟”，“冲过阴沉的天色，去听那塞外的胡笳”，企盼着“九月的晴空”，“大地的歌唱”^①。在饥寒交迫的冬日，他饱含忧伤，吟出的是一首首血泪交织的悲歌；春回大地时，他满怀喜悦，唱出了一曲曲劳动创业者的颂歌。他把心窝里酿造的美酒，心房里开放的鲜花虔诚地奉献给养育自己的人民。冰心称道他是一位“功力很深的散文作家”。他在散文艺苑的耕耘、探索，取得了不同凡响的硕果，留下了自己的思想历程和艺术经验。研究这位作家，对于今天振兴散文是很有助益的。

徐开垒的散文创作迄今已经历了四十几个春秋。然而，对于他的散文作品的研究还是近几年的事情。作家自己也是在这几年才开始回顾以往的创作道路。一些研究者从鉴赏的角度，从散文艺术的特点，分析、评价了徐开垒散文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指出了作家在不同时期的创作基调，有过不少切中肯綮、论析精辟的评论。但是，对徐开垒其人、其文、其生活与创作道路宏观的认识与综合的剖析却较少涉猎。这是需要我们致力探讨的课题。

文学是表达感情的艺术，是作家在审美意识规定下产生的一种自觉的情感上的追求。为了完美地实现这种追求，作家要选择

与自己的气质、素养、爱好相适应而又是自己最擅长的文学样式。一般说，一个作家选择自己驾轻就熟的文学样式，从一开始就不会是盲目的。而文学样式为作家开垦自己的创作园地，也不是作家可以随心所欲的。

徐开垒与散文结下不解缘的直接动因，则是我国古典优秀散文对他的熏陶，现代散文诸大家对他的影响。徐开垒这样说过：

“散文是我学习文学最早的一个品种”，“我在小学时就被《陈情表》、《项脊轩志》、《祭妹文》等文章所感动。《孟子》则是我的主课。”^②如果说，这种文言散文的熏陶只是起到发蒙的作用，使他具备了初步的知识素养，萌生了对散文的喜爱；那么，“五四”时期散文诸家作品的感染与引导，则对他立志投身散文创作事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鲁迅的《藤野先生》，朱自清的《背影》，冰心的《寄小读者》等名篇佳作，强烈地扣响过他的心弦。而当时适逢新文学运动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巴金、叶圣陶等大家的积极倡导与扶持下，散文阵线异军突起。在这种情势下，徐开垒作为现代散文的一个忠实读者，怀着浓厚的兴趣，每每“让何其芳、丽尼、陆蠡、芦焚等作家引入语言艺术的王国里，走进比现实世界更其多彩的散文之家。”^③进大学中文系时，又得遇名师王统照的指点，研读了《文赋》等有关散文理论的专著，为他“进一步鉴赏古今散文家的杰作，提供了一些条件。”^④这说明，从早年开始，徐开垒散文的根须，就深扎在中国散文优秀传统的丰厚土壤里；也正是从早年开始，徐开垒对中国散文的历史与现实，经验与教训孕育着较强的自觉意识。所以才使他的散文追求从起步就呈现出明确的目的性，使他的散文审美观念呈现出以一贯之的稳定性。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以为徐开垒是思想上有准备，知识上有积累，艺术上有功底 的散文作家。所谓厚积薄发，能够比较恰切地概括徐开垒总体上的特点。

徐开奎很早就宣称他之所以要写散文，“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⑤，亦即“为情而造文”。他多次明确地指出：“散文是作家直接表达感情的文学形式，它比任何文学形式更需要真情实感”^⑥。他将“真情实感”和“深邃的思想”视为散文的灵魂。因为，散文总是以自己活泼多样的形式通过个性表现共性，从小我表现大我。它要求作者不要回避表现自我。所以，表达真情实感，抒发内心对时代精神的感动，象候鸟的歌唱，就成为徐开奎散文追求的旨归。这种追求使徐开奎和他的散文显示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在审美观念上，徐开奎一贯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早年他对汉赋铺陈的句式和浓艳的诗藻及由此产生的弊端有过许多思考，因而他反对散文创作中的唯美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在他看来，散文取胜的秘诀，不在于斑斓的外壳，而在于丰富多彩的内容和这种内容的新鲜感与概括性，在于作家对特定素材的观察、感受能力。对散文内容的重视，他的认识最终升华到这样的高度：“散文作为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它在揭示生活矛盾的深度和广度上，应该有与小说同样的负荷。而我们时代的散文恰恰在这方面至今还没有很多篇章能达到这样一个高度。”^⑦究其原因，主要是作家对生活的矛盾、本质和主流缺乏应有的认识和把握。所以，他又着重指出，向这个高度攀登的必由之路是深入生活，“如果散文作家是自由的鱼，那么生活就是他们一刻离不开的水。”^⑧这是徐开奎在建国以后逐渐认识到的生活对于创作的决定性意义，并以这个观点回顾了他早期的创作历程。因此，他认为作家必须首先具备把握生活底蕴的能力和深厚的生活积累，然后才可能充分发挥驾驭、选取和加工素材的艺术技巧。显然，这个观点的着眼点并非不讲究技巧，而是把技巧建立在把握内容的坚实基础上。正如杜牧所说：“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

高”，相反，脱离现实生活，缺乏真实的思想感情，刻意雕琢，追求藻饰，必然导致文质俱败，所谓“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

从这个角度观察徐开垒，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从少年时代开始接触的特定生活环境，使徐开垒一直栖身于社会的底层，加上又从鲁迅以浙东生活为背景的作品得到启示，因而形成了徐开垒观察生活的独特视角，出现了徐开垒散文作品特定的描写对象，开拓了徐开垒散文作品的一贯性题材领域，那就是他以炽热的感情不倦地抒写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旧社会“小人物”的苦难遭遇和朦胧的希望，发掘新社会平凡劳动者心灵的美质，歌颂知识分子的坚韧、平凡和崇高以及他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是徐开垒用他全部的散文作品，为我们勾画的一条与其他作家迥然相异的清晰的轮廓线，一个不曾间断的完整连贯的发展轨迹，并且逐渐形成他的创作观念：“不要忘记，散文也应当写人物”，“散文也可以塑造艺术典型。”⑩

徐开垒曾深有感触地回忆他少年时代的生活。在三十年代的宁波市街，到处有各种各样的“苦力”：沿街叫卖的行贩，汗流浹浹的黄包车夫，满身污黑的打铁工人，修配竹器铜勺的各种师傅，以及从农村上城来的瘦骨伶仃的农民和渔人……⑪这一幕幕下层社会的各种人生惨剧，都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激发了他要为之控诉、呐喊的强烈愿望。即使抗战初期到了上海后，他仍念念不忘宁波城里的那些劳动者，以至日夜萦系，无法释然。于是他拿起笔，为这些可怜的“小人物”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那敲了几十年钟、终于默默死去的老校工，善于钓鱼而最后却被日本人“钓”去死在异乡的渔民，专替人家算命而却无法探寻自己前途的测字先生……都有他身边所熟悉的人物的影子。这些人物的不幸命运，是遭受民族压迫的沦陷区

人民所共同感受的，同时也与徐开奎自己家庭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命运相联的关系，使徐开奎始终和他笔下的人物有着一种心灵的默契，感情的共鸣。徐开奎散文最终靠这一点来赢得读者，取得其不可替代的独立存在的价值。

这样，本来是自发产生的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关切与同情，经过漫长的历史淤积和沉淀，逐渐在他心中凝聚成一种强烈而稳定的审美追求，养成以表现普通劳动者为使命的审美情趣。而记者与编辑生涯又恰好为他开拓了广阔的生活天地，使他面向社会，扩展了人生视野。这样就使他的散文以自己独有的芬芳与色彩，区别于那些描写风花雪月或身边琐事的作品而受到人们的炯炯瞩目。他的成功将作为生活对作家赐予智慧与活力的范例，永远昭示后来者。

从上面粗略的勾勒，可以窥视徐开奎散文观的孕育与发展，反映在他的散文创作上就是呈现在字里行间的时代气息、生活气息和质朴的个性。

徐开奎的散文虽然很少直接反映重大的社会题材，但他写的故事、场面却总是透露着一定的时代风貌。从抗日战争以前直至今天，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都用自己细腻的笔触，描绘时代的侧影；用自己敏感的歌喉，唱出人民的心声。从他的散文中，我们不但看到了一位作家跟随时代而前进的生活脚印，而且也看到了中国人民从沉沦和黑暗中解脱，从屈辱和痛苦中崛起，开辟自己当家作主的新世界的历程。从创作题材考察，徐开奎的散文大多充满着生活气息。他的视野，他的思索，总是朝一个方向，不断向纵深开掘。不象其他一些现代作家那样，随着世界观和思想的转变，在素材选取和作品主题上出现复杂性和矛盾性的状况。他从一开始就受到地下党和左翼作家作品的影响，思想上带有明显的进步倾向。作品的描写对象从解放前的“小人物”到

解放后的普通劳动者，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都是表现平凡劳动者不平凡的美质，雕塑普通劳动者与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他的描摹和雕刻总是渗透着自己的深邃的思想与真挚的感情，保持着生活本身的质朴、自然和优美，从不靠五光十色的羽毛来炫人眼目，最终达到返美于淡，返璞归真的境界。纵然岁月蹉跎，道路坎坷，他的这种艺术追求始终没有间断过，形成了作家不可移易的个性，它好像没有休止符的音乐，没有曲折的河流，使他的作品前后衔接，浑然一体。下面我们再从他的创作实践作具体的考察。

徐开奎的生活与散文创作道路，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1）新荷初绽（1922—1937）：这个时期包括童年、少年求学和最初的起步三个层次。

一九二二年三月，徐开奎出生于浙江宁波城内一个银行职员之家。这是一个带有开明色彩的封建家庭。饶有趣味的是，在这个家庭环境中，他一没有从经商的祖父那里学来生意经，二没有从在银行谋事的父亲那里学来尽心供职的本领。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念念不忘的是那些出身苦力家庭的小伙伴。他最感兴趣的是和这些小伙伴混迹于宁波市的苦力群中，看他们劳动，听他们说话，用一双好奇的眼睛，观察他们异样的举动。似乎上苍从一开始就赋予了他热爱苦力的秉性。就是在家，他和保姆接触的时间，也要比和父母接触的时间多得多。他从保姆那里学到的操作技能，也要比从父母那里学到的东西多得多。他似乎过早地看到了社会的不平，本能地对他所热爱的苦力倾注了真挚的同情。这对他以后从事散文创作起到了重要的生活积累的作用。在当时宁波最大的“籍香小学”毕业后，他进了当地著名的“效实中学”。一九三六年十月，在这所中学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一个偶然的生活浪花，激起了他最初的写作灵感。对生活和素材异乎寻常的敏感和发现，从来是创作的契机。当时，正值蒋介石

提倡所谓新生活运动，不准人们在路上赤膊行走。这道禁令使那些穷得连破衣烂衫也没有的苦力怒不可遏。他从两个泥水工匠愤愤不满的牢骚中得到启示，发现了其中蕴含的社会意义。于是提笔写下了一篇短文《两个泥水匠》，投寄给上海叶圣陶、丰子恺等人主编的《新少年》半月刊，因为他们正在举办题目为“小人物访问记”的征文，结果不但很快发表，而且在众多同类题材的稿件中，名列榜首。少年时代的徐开奎，从事写作的第一篇文章，竟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不久，他又以一个同学因阅读《吼声》杂志被国民党当局视为赤色分子而逮捕的事情为素材，写了第二篇作品《这是事实》，再次在《新少年》上发表。新人的两篇佳作，引起了编辑的重视和好评，在《编后记》栏目中，用热情的语言，对徐开奎的才华表示了肯定和赞赏。

这两篇作品是徐开奎自幼年开始观察“小人物”生活，思考“小人物”命运的最初成果，成了徐开奎从事文学创作的发端，也是他走向散文创作道路的起点，并且为他专事描写“小人物”的散文作品定下了基调。正如他自己所说：“由于这两次鼓励，决定了我以后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和新闻写作的命运。”^⑩

（2）飘零孤岛（1937—1949）：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日本飞机“整日整夜向宁波城乡投掷炸弹”的时刻，十五岁的徐开奎随家人汇进逃难的人流，“在生存竞争的‘潮水’中被冲到上海”。^⑪这是徐开奎生活和创作道路上的第一个转折。从此他开始涉足上海文坛，在散文、诗歌、小说等文学领域中探索和尝试，并结下了第一批硕果。

“孤岛”时期，在徐开奎长达十二年之久的旧上海生涯中是一个重要阶段。他在这个阶段度过了人生中最可宝贵的青春年华。险恶的政治形势和复杂的斗争环境，促使他迅速觉醒。从一

个过早对社会和人生有着观察、思考和见解的少年，逐步成长为一个有着明确而执著的追求，对社会有着使命感、责任感和正义感的青年作家。无论在思想，还是在艺术方面，徐开奎所取得的以抒情散文为代表的文学成就，都标志着他的文学创作在这时开始走向成熟期。

自从离别自己的故乡，他到上海以后，在柯灵主编的《文汇报·世纪风》副刊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阴天》，随后又在《万象》、《宇宙风》、《春秋》等刊物上接连发表了《流星》、《静》、《记忆》、《黄昏钟声》、《夏夜的风》、《望雪篇》、《归去》、《生之寂寞》等一系列散文篇什。这些散文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集中抒发了生活在“阴云笼罩着的”、“没有阳光，没有雨露”的上海孤岛中，一个“复仇的火焰在心中燃烧”的热血青年，诅咒黑暗，向往光明，“渴望有一声雷来自天边”的愤懑抑郁的爱国主义情绪。这些散文大多是抒情体，篇幅短小，结构精巧，语言洗练，韵味绵长，酷似散文诗。徐开奎对散文艺术的刻意追求，从这些篇什中最早地表露出来。

这一阶段，徐开奎由初中升入高中，又由高中考入暨南大学文学院深造。在大学期间，一边读书，一边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担任助理编辑。除了主要从事散文创作外，他还在一九三九年《上海一日》大型报告文学集中发表作品《飞鸟》；在《鲁迅风》第十一期上发表诗歌《笼里》；在《自修》周刊上连载过他的论文谈史的《文知集》和《史心集》；还发表过短篇小说《报应》、《两城间》、《三代》等。这些作品说明散文作家徐开奎的创作领域并不是单一的。在文学道路的早期，他所涉猎的体裁范围也呈现出多样和驳杂的特点。

抗战胜利后，徐开奎所从事的报纸新闻工作，一方面使他开阔了生活视野，增加了与社会各阶层接触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使

他的散文笼罩着一层浓重的纪实色彩。作品多从社会生活的一隅，多从“小人物”的悲苦命运，来反映旧上海的凋敝、败落和腐朽。此时徐开奎对旧上海的黑暗现实看得更真，体会得更深，在思想感情上，由“孤岛”时期的忧郁更多地转变为愤激、憎恨，并产生了对未来的憧憬和朦胧的希望。在作品的格调上，作家长于幽默，手法上偏于白描，对所描写的“小人物”流露出一种无限的怜惜之感和挚爱之情；同时，作家也常用幽默讽刺的腔调，对旧上海官府各色人等的嘴脸进行传神的刻画和辛辣的嘲讽，我们从中看到了旧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这类作品，主要有《掘井前后》、《乡长和保甲长他们》、《卫生科长》等篇。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作品的倾向，在上海沦陷时期发表的《生之寂寞》、《三代》、《钩》三篇作品中已一见端倪，它们留下了徐开奎纪实性散文逐步深化的痕迹。

（3）人到中年（1949—1965）：

徐开奎在经历了漫漫长夜之后，终于走出了旧上海阴暗的亭子间，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他的散文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他最早在党办的华东新闻学院学习。接着又以作家的身份，参加文联组织的土改工作队，来到松江专区参加土改，同时在上海《文汇报》担任记者、编辑，文艺副刊《笔会》主编。

徐开奎这一时期的散文，从题材上说，着重描写了人民改造山河，建设祖国的伟大斗争，从一个特定侧面，真实地记录和再现了江南地区人民在土改、合作化、崇明围垦，以及修建新安江水库进程中的平凡劳动。他选取素材的特点，是从大时代潮流中撷取一朵浪花；不是对新时代生活作全方位的扫描，而是选取宏伟斗争全景的一个闪光点，“见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从人物上说，他笔下勾勒的全是平凡劳动者，他一直在为普通劳动者塑造不朽的雕像。从主题上说，他着力挖掘平凡生活中

不平凡的底蕴，和普通劳动者潜在的美的品质。应当说，徐开垒的这种苦心孤诣，是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的。从格调上说，这一时期的散文一扫早期的抑郁，而跳荡着明朗、昂扬的旋律，催人奋发向上，富有新生活的澎湃热情和新时代的强烈气息。作者以一位与时代同步的歌手的面目出现，唱出的是对新生活、新人物的颂歌。这一切是和作者对新生活积极肯定的人生态度密切相关的。人们在这一时期对他的作品特别感到兴趣的，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的《竞赛》一类作品，它的篇幅不过一千五百字，抒发的是对一个十五年前读大学时的同学的怀念之情，发表后不仅在《文艺报》上受到推荐，以后曾被中国青年、人民文学、上海文艺等出版社出的“十年散文选”中选入，而这篇作品的特点却在于主体意识浓厚，感情细腻，与当时流行的散文风格迥然不同。

但总的说来，徐开垒在这一时期散文的体例，基本上是记实体，或者说都是记者式的实录。象《竞赛》这样风格的作品并不多见。纪实体的特点，是和徐开垒自抗战胜利以来就从事的新闻记者职业一脉相承的。这是徐开垒迥别于一般散文作家的地方。对素材本身特有的新鲜感，作家对读者一定时期审美期待的敏感性，以及编织成篇的特定结构技巧，构成徐开垒这类散文艺术魅力的三个要素。当然，驾驭这样的方法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对生活各个侧面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向要有早于读者的感知和把握能力。不言而喻，长期从事记者编辑工作的徐开垒，自然会有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有机会深入到社会基层的各个角落，结识、采访各种各样的人物。用形象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他象一只蜜蜂，总是最先寻见到那植根于生活的沃野上散香滴露的鲜花，最早闻到花的芬芳，吸吮花的乳汁，然后经过加工，酿制成蜜，于是人们才始得品尝蜂蜜的香甜。

然而，这一时期的散文有一些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那就是在当时流行的文艺的思潮影响下，徐开垒在压抑中回避了自我，淡化了作家的主观个性，以至在作品中，影响了作家主观真情的流露。尽管强调散文的客观记实性，使徐开垒散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不可避免地给他的散文带来了局限，即过分的拘谨。和“孤岛”时期那种精美的抒情篇章相比，除了象《竞赛》、《雕塑家传奇》、《新安江灯火》、《围垦区随笔》、《第一栋树》等优秀作品外，这一时期的某些作品似乎失之过实，缺乏一种生活的韵味和意境美。就这一点而言，显然违背了徐开垒散文创作“为了要抒发自己的感情”的初衷，这些作品将作为徐开垒创作道路上一度丧失自我、抑制艺术个性的教训而值得人们记取。

（4）劫后逢春（1979——1986）：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被迫停刊的文汇报《笔会》获得新生。徐开垒重新主持了副刊。长期被迫搁笔的巴金、艾蕻、于伶、柯灵、罗荪、王西彦、秦兆阳等一大批作家都在《笔会》发表他们在劫后的第一篇作品。巴金的《一封信》从《笔会》上响起了我国文坛复苏的第一声春雷，短篇小说《伤痕》、《枫》等作品的发表更给再一次复刊的《笔会》带来新的热潮。徐开垒及其同仁以《笔会》为阵地，在文艺界发挥了拨乱反正、振聋发聩的影响。与此同时，作为散文家的徐开垒也进入了新的创作时期。

一九七九年四月发表的《幽林里的琴声》，是徐开垒自“文革”以来，被迫辍笔之后的第一篇作品。这篇作品成为徐开垒向新的散文创作目标迈进的起点，也是他摒弃“左”的禁锢，思想得到解放的转折，它迎来了“接待‘我’”回到散文领域里的创作新潮。继他的小说特写集《孟小妹》于一九八一年出版，反映他散文创作历程的《雕塑家传奇》散文集也于八十年代初期问

世，接着他的新的散文集《圣者的脚印》、《鲜花与美酒》以及《笔里》又相继出版。这几本散文集的出版说明一旦摆脱沉重的精神枷锁，徐开奎又表现出多么惊人的创造力！这是他长期受到压抑的能量的总喷发，是徐开奎从一开始就形成的抒情散文观念在更高水平和层次上的回归。

这一时期徐开奎散文的成就，首先表现在思想内容上的拓展。相对于五十、六十年代那种对生活直观、平面的描摹，这一时期散文加强了历史纵深感，在内容上实现了深度、广度和力度的开掘。比如《幽林里的琴声》，这个作品写了三个不同职业的妇女。作者在深广的历史线索上，寻找这三个妇女形象的横向联系。她们一个是教师，一个是机关秘书，一个是纺织工人，虽然职业不同，但是经过十年浩劫，她们都有大致相同的厄运和遭遇。十年浩劫的悲剧，表现在这三个年轻妇女身上，是耗尽了她们最可宝贵的豆蔻年华，使她们火红的青春付之东流，使她们的人生价值受到贬抑。这样的控诉，这样的鞭挞，应当说是异常深沉、有力的。在《烟》中，作者通过一个老妈妈的眼镜，追溯前两次烟囱不冒烟给她带来的不幸，抨击了解放前资本家和十年浩劫极左路线的罪恶，而在篇末引人入胜地强化了实现现代化生产管理后，烟囱不冒烟的喜剧效果。在漫长的历史线索上，反映了今昔的巨大变化。在《山城雾》中，作者随着自己连绵的思绪，给不同历史环境下的重庆雾，赋予了不同的政治色彩和历史内容，说明只有在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以后，才使“山城的夜雾渐渐散去，它在黎明中露出巍峨的真相”。主题新颖，不落窠臼，使人耳目一新。《森林和森林老人》（《当代》1986年第1期）使我们看到了迷人的森林王国，神秘的饱经沧桑的森林老人，听到了森林的平凡而深奥的语言，自然之神与森林老人的深含哲理的对话。作家对历史的淡淡的回顾，对人生的深沉的思

考，给读者许多联想和启迪。这些作品无不渗透着作家主观的真情和个性。这些作品中的形象，并不简单地只是客观对象本身，同时还是作家思想观念的对应物，是经过文学主体——作家的心理折光以后，和思想、观念凝聚而成的复合形态。本来无多意义的或看起来极为平常的客观对象，一经作家思想火花的撞击，便会发出异样的光彩。如果说，文学主体性的加强是新时期文学的普遍趋势，那么，徐开垒散文则是其中突出的一例。

这一时期徐开垒观察生活的视角的调整，描写对象的变化使他的散文审美空间得到相应的延伸，题材领域得到相应的扩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突出成果，是洗刷了长期以来泼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污泥浊水，重新肯定和高度评价了知识分子在劳动人民行列中的平等地位和在新四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徐开垒以他对时代心绪的洞察和敏感，恰到好处地把握了历史潮流转折的契机，把他的视角和描写对象集中到了知识分子形象上。以《圣者的脚印》为代表的散文，便是描写知识分子的优秀散文的集萃。在这部散文集中，作家遨游在回忆的大海里，追逐着那些使他感到欢腾振奋的思绪的浪花。他的笔，从各个不同角度，为读者留下了鲁迅、巴金、叶圣陶、冰心、王统照、丰子恺、柯灵、傅雷、邹鼎丁等文化名人的片断印象，就象灿烂阳光照射下的大潮飞沫，作家捕捉了它一刹那间耀眼的闪光。时间虽然短暂，记忆却是深刻的，永存的。

至此，从旧上海时期的写“小人物”，到五十、六十年代的刻划普通劳动者，演变到近期创作中的知识分子，徐开垒完成了他散文创作道路上的“三级跳”。这是一个互相连贯的，非常完整的运动过程。虽然可以分解为三个互为条件的动作层次，但是动作方向和终极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对描写对象心灵的重视和开掘。

这一时期徐开奎的散文令人注目的地方，还在于独具匠心的构思，引人入胜的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意境美。新奇的立意，精美的形式，这是万千散文家追求的一个目标。徐开奎对散文艺术目标的追求，没有比这一时期更自觉、更强烈、更卓有成效了。象广为人们称道的《忆念中的欢聚》，作家在那“幽静的忆念的王国”里沉思冥想，用拟人化的手法，和昆明、广州、武汉、长沙、南昌、桂林、杭州、宁波、上海、北京，这些久别的“朋友”重逢，握手言欢，亲切交谈。随着作家的笔触到处，读者不仅领略了这些城市的奇特风光，而且还可以深切感受到这些城市的独特性格。全篇以忆念为经，以地名为纬，纵横交错，气势贯注，笼罩着一个新闻记者对祖国大地上每一个珍珠般城市深深的恋情。同时，作家多次运用“如果赋予城市以人格”这种重迭和复查，实现散文上下结构的衔接、转换和过渡，使文章脉络清晰，开阖自然，天衣无缝。再加上首尾呼应，卒章显志等技巧的成功运用，增加了作品感人的魅力。再如歌颂著名动物雕塑家邹鼎丁的名篇《白玉兰》，从“山明水秀的杭州，美景如画；既出艺术，又出人才”的议论生发，自然引出主人公的雕塑艺术与杭州不可分割的联系；接着，通过“我”与主人公的对话，追溯了主人公象一部二十四史一样，充满传奇色彩的艺术生涯，展示了主人公磊落豁达的胸襟和对动物雕塑艺术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探求精神。作品两次描绘点染洁白晶莹，挺拔高大，一尘不染的白玉兰，借以赞美主人公的高洁品质，言近旨远，耐人寻味。这些篇章除了保持徐开奎的严谨、平淡、质朴之美的一贯特色之外，深沉的感情，动人的神韵，含蓄的笔调，浑厚的气势，不同程度地展示了徐开奎近期散文的新的走向。

如今徐开奎已逾花甲之年，他的创作历史也将近半个世纪，虽然他常说自己的园地是荒芜的，但从散文难于多产的特点，总